

一位西方人对杜甫的致敬

访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导演迈克尔·伍德

●在片中，伍德不仅盛赞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还借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史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评价，将杜甫与西方文学巨匠但丁、莎士比亚比肩

●“只称杜甫为诗人是低估了他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称呼将他的地位局限于诗人。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一个与杜甫完全匹配的人物，一个体现了整个文明情感与道德感的人物”

●伍德想做的“就是让观众感受到有温度的历史。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很有情怀，他们爱他们的历史”

●《杜甫》播出后，伍德收到许多西方观众的积极反馈，“他们告诉我，很高兴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片”

●“纪录片产生了实际影响，为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理解提供帮助，这正是我喜欢制作纪录片的原因”

●“面对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友好声音，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污蔑和抹黑，我像中国人一样感同身受，很难过。中国无论如何不该遭受这样的偏见和攻击”

●《杜甫》纪录片在英国的播出“恰逢其时”，因为即便它很微小，也在疫情阴霾下发出微弱光芒，为西方观众提供新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中国，了解中国人的感受和想法

本报记者张代蕾、桂涛

四年前，因为一部追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大型英文纪录片《中华的故事》，英国历史学家、纪录片导演兼撰稿人迈克尔·伍德为许多中国人所知晓。两年后，他制作推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仅预告片就有超过1亿人次的观看量。今年4月份，他导演并主持的单集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BBC播出，再次受到英国媒体和观众广泛欢迎。

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多次到中国采访拍摄，“在中国感到很自在”，相信交流对话有助于打破文化之间的偏见与误解……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伍德成为不少眼中“最会讲中国故事”的西方纪录片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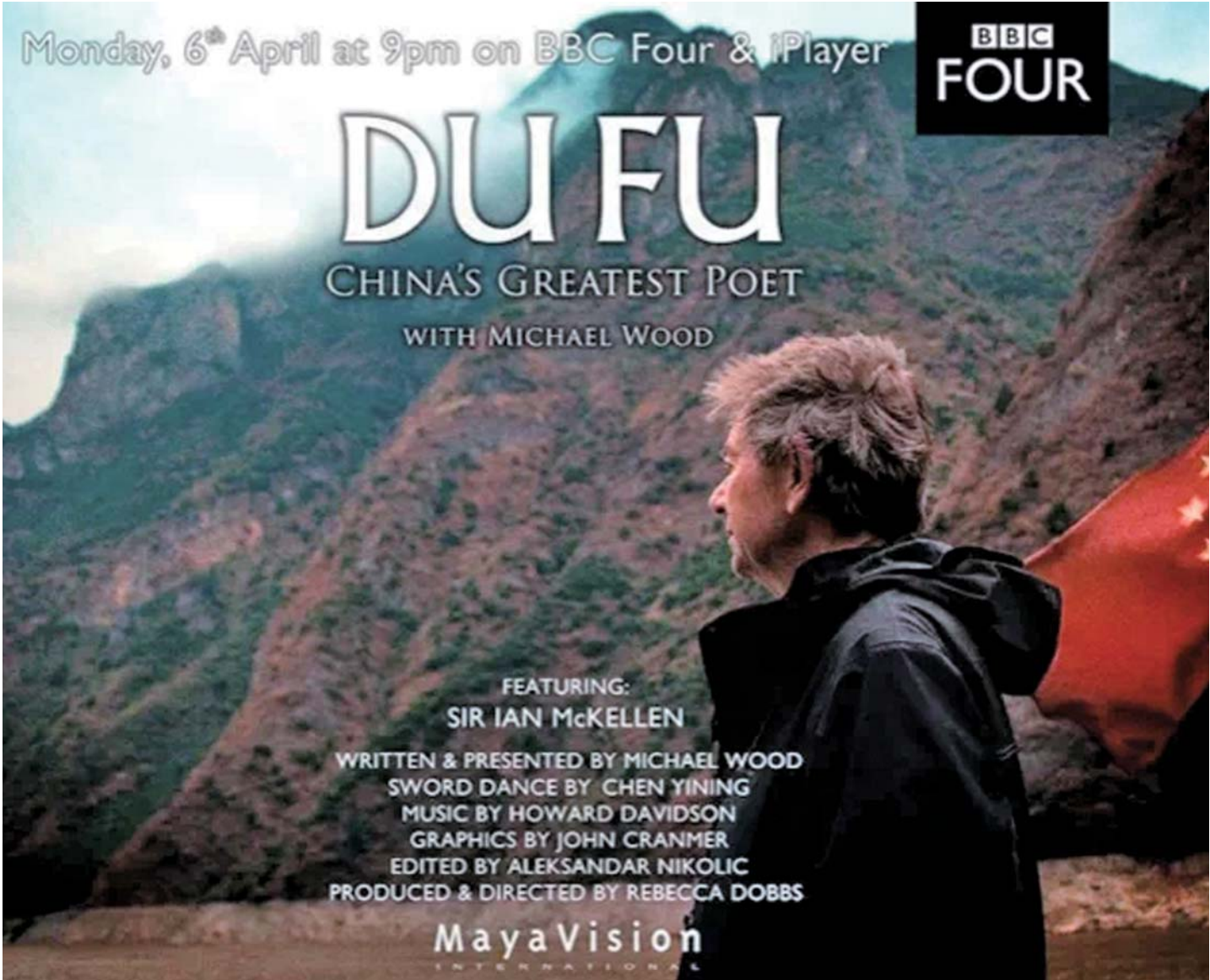
曼城男孩的“杜甫缘”

伍德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和探寻，从最近这部关于杜甫的纪录片中可窥见一斑。

“《杜甫》这部片子对我而言，其实更是一部出于私心、因爱而生的作品。”在近日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伍德多次提到他对杜甫的喜爱，强调这部59分钟的纪录片是他的“心爱之作”。

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启蒙正是源自杜甫的诗。“说起来你可能难以置信——几十年前，一个生活在英国城镇曼彻斯特的十五六岁男孩会着迷于中国诗人杜甫的诗。”他回忆说。

伍德1948年生于曼彻斯特，从家乡的文法学校毕业后，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他进



入牛津大学读历史专业。

在曼城念中学时，他在当地一家书店发现一套外国文学译作，其中一本就是杜甫诗集。“翻开这本书读到第一句，我就入了迷。它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世界，它如此丰富，如此精彩。从那以后，这些诗就一直留在我心里。”

后来他又陆续知道了李白、孟郊、白居易，以及更多唐朝诗人，“他们和杜甫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从未离开过我。”

10年前，他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期间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和现场观众聊天，询问他们最喜欢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结果令他吃惊。“每个人都回答唐朝，而且几乎人人提到杜甫。”

“杜甫在中国文化的地位如此重要，在西方却鲜有人知。”那时，他就萌生了要为杜甫单独制作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直到去年秋天，梦想终于成真。他和拍摄团队从杜甫出生地河南巩义出发，沿着杜甫生前足迹重走西安、成都、重庆、长沙等地，跨越半个中国，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叙事方式，介绍展示中国“诗圣”动荡不安、忧国忧民的一生。

在片中，伍德不仅盛赞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还借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史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评价，将杜甫与西方文学巨匠但丁、莎士比亚比肩，认为他们赋予了诗歌应有的意义和评价标准。

“只称杜甫为诗人是低估了他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称呼将他的地位局限于诗人。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一个与杜甫完全匹配的人物，一个体现了整个文明情感与道德感的人物。”伍德如此评价杜甫。

“我在中国感到非常自在”

身为历史学家，伍德最专长的研究领域是中世纪历史。而身为纪录片制作者，他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有温度的历史”。

他制作的120多部纪录片中，大多数与历史有关——《追寻文明的起源》《亚历山大东征传奇》《印度的故事》《英格兰的故事》等。

他撰稿并主持的《中华的故事》更从普通中国人的视角，追溯中国历史，讲述中国从古代夏商周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历史变迁。

《杜甫》纪录片中，伍德同样追寻中国古老文化在当今中国的传承和意义。在中国实地采访拍摄过程中，他找到了答案，而且印象深刻。

“我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交谈，每个人都能和我聊杜甫。在成都杜甫草堂门前读《春夜喜雨》的小女孩，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杜甫草堂的成都老人，湖南读诗会的成员，给杜甫诗作谱曲演唱的大学生们……从他们身上，我清楚看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消失，一直在延续。”他说。

伍德认为，纪录片导演必须对自己所拍摄国家的文化有所感知。“拍摄中国，你必须将自己视作中国人来看待问题，影片的内容必须以这个国家人民所理解的本国文化角度来呈现……因此你必须和中国人的文化产生共鸣，否则观众就无法理解你所拍摄的东西。我想做的就是让观众感受到有温度的历

史。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很有情怀，他们爱他们的历史。”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如今，因为旅游或工作，伍德先后去过中国十多次。“每次到中国拍摄我都过得很愉快，中国人友好、热情、好客……我喜欢去中国，在那里我感到非常自在。”

他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时，整个国家尚未从“文革”的震荡中恢复，“人们都穿着一样的灰色、蓝色中山装。”但从那之后，“中国经济、国家整体变化太大了，已经成为另一个世界”。

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聚焦了这段历史，认为“西方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就必须了解中国过去40多年发生了什么”。

为了这部片子，他到安徽乡下采访小岗村的农民，到温州与拿到第一份私企证书的女士交谈，站在香港对面的海角上，在如今摆满巨大集装箱的港口讲述深圳的故事。“这样才能向西方讲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特别是在教育、科技、环境、商业方面的问题。”他说。

拍摄《杜甫》期间，中国西南城市成都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我喜欢成都，那里的建筑、古迹、食物，我都感兴趣。当地人带我们去只有他们才知道的美味小店，让我们看当地美食如何烹制出来，很有意思。”

“理解中国需要一辈子”

对于中国文化，伍德经常称他是“局外人”。

“对我这样的局外人来说，理解中国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在多次往返中国后，我才开始理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才能明白他们的幽默和社交方式，他们对于食物的看重，以及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怎样笑才是最合适的。”他曾告诉记者。

比如饮食，伍德举例说，英国摄制组习惯随便吃个三明治就继续工作，但中国不同，中国摄制组到了中午通常会停工开始吃午餐。“对于他们来说，饮食的仪式感很重要。我认为中国人民对他们文化的尊重和热爱真的很重要。虽然东西方价值体系在基本框架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了解中国需要终生努力。”

对于中国诗词，他也谦逊地表示自己是“门外汉”，尽管在采访中他能随口向记者用英文背诵好几段杜甫的诗，包括长诗《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杜甫》纪录片中，他用杜甫这首自传性的叙事诗串联起主人公一生。为了向西方观众更好地传递这首诗的意蕴，他致信英国国宝级演员、《指环王》影片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邀请他出镜朗诵了15首杜甫诗文译作。

对于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他坦言“没有哪一部是完美的”，唐诗的复杂性让最近这部《杜甫》更是如此。“但我愿意尽力而为，向西方观众展示一些可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

《杜甫》播出后，他收到许多西方观众

的积极反馈，“他们告诉我，很高兴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片。”还有观众向他打听英国哪里可以网购到杜甫诗集的英文翻译，想要趁居家隔离期间潜心阅读。

他还曾在飞机上遇到一家前往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他们看了《中华的故事》，计划沿着片中的路线游历中国。

“纪录片产生了实际影响，为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理解提供帮助，这正是我喜欢制作纪录片的原因。”他说。

“文化交流的坚定信徒”

除了纪录片导演和主持人，伍德还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公共历史学教授，以及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这些身份都让他不断探索中国文化的魅力，长期支持英中文化交流。

“我是文化交流的坚定信徒，坚信文化交流能促进不同民族互相理解，消除偏见。”他说。

他提到，自己的家乡曼彻斯特一直与中国渊源很深，那里有“中国城”，有“全英国最好吃的中餐厅”，还有一所全欧洲范围内吸引最多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学府——曼彻斯特大学。

“每到九月份，你到曼城最中心通往大学的街道上走一走，能看到路边张贴着很多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中文信息，你能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和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国的一切在这里都是大事。”他说。

但眼下，他提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中断了英中之间许多正常交流，而疫情引发的可怕偏见更可能损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他非常不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的连接因为疫情和偏见而中断。

“面对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友好声音，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污蔑和抹黑，我像中国人一样感同身受，我很难过。中国无论如何不该遭受这样的偏见和攻击。”

而越是这种时候，越能体会到文化交流、互相理解的重要性，他认为《杜甫》纪录片在英国的播出“恰逢其时”，因为即便它很微小，也在疫情阴霾下发出微弱光芒，为西方观众提供新的视野，让他们看到中国，了解中国人的感受和想法。

“我期待疫情尽快过去，期待在曼彻斯特大学校园里继续看到许多中国留学生的身影，更期待我们能一起努力，搭建更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文化桥梁，共同消除偏见。”

而对于未来何时再去中国拍一部新的纪录片，伍德坦言还没有具体计划。但他透露自己一直对英中两国历史上首次外交往来特别感兴趣。

1793年，英国派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见到了清朝皇帝乾隆，领略了“乾隆盛世”。

“当时英国使团准备了什么礼物，有什么含义，英中双方如何从不同视角看待那次会见，对当今又有何启示？我有个小想法，想拍部片子探究英中历史上这第一个外交时刻。”

《单地》香港故事

沧海变桑田，那一条条海岸线，不断成为后来的内陆路，恰似湾仔成长的“年轮”，记录着香港从小渔港嬗变成繁华都市的光阴故事

本报记者苏万明、朱宇轩

湾仔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区域之一。从开埠之初的望海观音古庙（位于如今皇后大道东上），到现存的当时顺海而行的电车轨道，再到后来的告士打道、会议道……沧海变桑田，湾仔那一条条海岸线，不断成为后来的内陆路，恰似湾仔成长的“年轮”，记录着香港从小渔港嬗变成繁华都市的光阴故事。

“牛刀小试”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智鹏介绍，1840年以前，香港居民多以务农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新界，整个海岛的人口不超过8000人。位于港岛北面的小渔港湾仔，人口则不足2000人。开埠后，大量外国商户活跃在湾仔、中区一带，湾仔成为外国人、上流社会的社交活跃地。19世纪50年代，华南地区爆发变乱，不少居民“走难”至香港，香港人口激增。香港政府开始向湾仔以东一带填海。

根据湾仔区文化历史旅游推广小组撰写的《寻找湾仔海岸线》研究报告，1851年，香港政府制订了第一个填海计划，建议由西营盘至铜锣湾一带建筑一条横贯整个城市的海堤。

没想到，1855年正式公布计划后受到当时上流社会的反对，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船坞经营。时任总督约翰·宝灵将目光投向了湾仔的一大片低洼地——湾仔摩厘臣山以东、利园山以西，南面是黄泥涌村前的农地。每逢雨季，这片低地就会被从三面涌下的雨水淹没、无法使用。宝灵计划将这片低地填高，卖给发展商。

宝灵还计划将黄泥涌村前的农地填高作跑马场。当时，上流社会人士都热衷赛马，计划获得他们大力支持。今天的鹅颈涌及其附近的地方，就是当时填海所得土地。

此后至19世纪60年代，当时在任的总督也积极建设各类海堤工程。直至1868年，湾仔零星共增加了约3.5公顷的土地，新地由云咸街推进至般咸道，再伸展至德辅道东一带。

规模填海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间，香港人口攀升、住屋拥挤、卫生环境堪忧……各界人士纷纷呼吁，香港迎来有规模的填海时代。

政府首先启动的是中区填海计划。《简明香港史》介绍，填海工程1889年正式展开，填海范围西起西营盘的屈地街，东至中环的海军船坞，全长约3.2公里，宽76米，填获新地共24公顷，原来的海岸线向北推移，延伸至现在的干诺道中。

随着土地增加，外国人口不断涌入，据统计，1900年左右，香港人口已经增加至30万人，湾仔是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为继续纾缓稠密的人口，香港政府在1921年展开海旁东填海计划，填海范围从海军船坞以东的军器厂街开始，至铜锣湾怡和洋行货仓为止。

挖掘技术不足、工人罢工、工程费用不断增加……填海工程困难重重，直至1930年，海旁东填海工程终于完成。湾仔不仅新增了35公顷的土地，还重建了输水管道、排水渠、道路和建筑等，城市配套设施逐渐完善。

填海工程完成后，湾仔吸引不少海外华侨华人和内地居民来港投资及居住。一时间，工厂、商铺、酒店等建筑拔地而起，有轨电车沿着海岸线驶过，湾仔一派欣欣向荣。

全盛时代

香港商贸迅速发展，现有土地已不足以满足庞大的需求。1922年，香港成立了负责城市规划的委员会，规划了香港未来50年的长期发展。委员会建议，香港继续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包括将旺角避风塘及中环添马舰总部进行填海，以铺设九广铁路及其支线。1948年英国城市规划师艾伯克隆比又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填海工程扩展至九龙南部以增加土地，同时开发新界，兴建新市镇。

1965至1972年间，湾仔填海计划迅速展开。工程完成后，湾仔的范围随即伸展至今天的会议道一带，港岛北岸的海岸线再次延伸、向北推进。这段时期，香港正经历“经济起飞”，商业活动也因中环区的商业楼宇供应饱和而渐渐向东扩展，湾仔填海工程正好回应这一趋势，湾仔顺理成章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区。

随后，香港艺术中心、新鸿基中心、香港演艺学院、华润大厦、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中环中心（旧翼）等建筑相继落成，这些建筑不少已成香港地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湾仔填海工程快马加鞭进行。从1983年至1991年，香港刊发的《海港填海及市区发展研究》《全港发展策略》及《都会计划》等多份官方文件都提及湾仔迫切需要填海。

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资料显示，湾仔填海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1994年开始，1997年结束，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北面，以填海的方式开拓一个岛，为扩建会展中心提供土地。第二期自2009年开始，旨在提供土地兴建中环及湾仔绕道，东区走廊连接路和其他道路，计划容纳地铁沙田线至中环线和北港岛线，并兴建一条延伸的海滨长廊。目前，大部分工程已完成。

去年9月出版的《湾仔画当年》一书写到，随着湾仔的海岸线变迁，湾仔码头由昔日的海旁东迁至分域街，再迁到会展附近的位置，一再北移，“或许不久的将来，九龙与香港两岸又会再走近一步”。

湾仔年轮